



人物春秋



浩气长存

——记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位县委书记
郭方烈士的英雄事迹

温治臣 郭永秀 姜玉央*

—

1938年春，八路军宋邓支队来到平西，开辟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平西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往北平、天津、平北和冀东的门户，也是冀中十分区的战略后方。中共北方局、延安八路军总部、中共河北省委等都派过军政干部到平西开展工作。

1938年4月末，晋察冀军区五支队到平西接防。根据晋察冀军区分局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指示，从部队抽调得力干部到地方开展工作，建立健全县政权，改造地方武装。

五支队派杜伯华、郭方、贾嵩明、尚英，到房山五区抗日

* 温治臣：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中心小学主任
郭永秀：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中心小学教师
姜玉央：房山区佛子庄乡中心幼儿园教师



根据地做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筹备工作。经多方筹备，于5月5日在长操村建立了房良联合县抗日救国会，由郭方任主任，下设组织部、宣传部。



房良联合县政府遗址

5月8日，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长操村建立，县委书记郭方，县长杜伯华。整个河套沟下起磁家务村，上至堂上村，南起南窖、北安，北至大安山、北峪村，有50多个村，成了抗日根据地。救国会和县政府就设在长操村王友吾家的外院。

二

郭方，字紫荣，1908年生，坨里村人，中共房良联合县抗日救国会第一位主任，中共房良联合县委会第一位书记。

郭方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非常好，父母又重视孩子学习知



识，专门请老师来家里教孩子。在房山上高小时，他就受到革命思想教育。他学习成绩非常好，在班里长期排名第一，获得大金牌子（现在的奖状）。高小毕业之后，15岁那年就去北京城里学做买卖，一学就是三年。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并积极参加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经人介绍，他秘密



郭方烈士遗像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特别爱读书，时常读书到深夜，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眼界开阔，心胸豁达，关心祖国的前途，一心一意为人民求解放。

三

1931年9月18日之后，抗日将领赵侗带领被日军打散的残部入关，来到北京，先后与郭方、杜伯华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一起进行革命斗争。1936年，郭方和许多的革命志士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德胜门第二模范监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杜伯华受党组织的委派，参与了赵侗部的“国民抗日军”的创建。之初，苦于没有兵源，他们想到了劫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救出郭方，吸收被押的政治犯和犯人中的抗日



积极分子，来扩充队伍。

1937年8月22日，按事前研究方案智取北平第二模范监狱。由吴静宇化装成日军炸开狱门，赵侗等将士一拥而入。首先，破坏警报器，割断电话线，缴获全部狱警枪支，然后开监放人，解救了包括黄秋野、郭方、李海涛、马载、刘平、韩庄、杨成、王洁青等587人，除一些老弱病残外，郭方等240人参加国民抗日军。

1937年9月5日，国民抗日军在三星庄村召开全军军人大会。重新任命了杜伯华、郭方、贾松明等军政委员和各级领导人，正式确定了部队的名称以及标志。大会由赵侗首先宣布全军基本纪律，正式定名为国民抗日军，授了军旗：红色旗帜，白色旗裤，写有“国民抗日军”五个字，还向战士发了红、蓝两色的袖标，红色在上表示战斗，蓝色在下表示祖国河山。国民抗日军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又称学生军。从此，“学生军”“红蓝箍”在平郊群众中闻名遐迩，开始与日寇正面作战。

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于1937年10月26日和1938年1月31日两次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国民抗日军的成立，奇袭德胜门外第二监狱以及黑山扈大捷的消息。指出国民抗日军“义声所播，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焦若愚、林一民、戴昊、谭伯、胡旭、李望东、曹裕民、黄秋平、邹富夫等此时也前来参加国民抗日军。在抗日斗争中，由于郭方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思想先进，又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很快就成了国民抗日军的重要领导人，为队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名义致信赵侗，邀请共同合作。八路军总部代表吴伟带领十余人与赵侗接洽，共商抗日大计。赵侗还会见过晋察冀军区独立团团团长杨成武、政委邓华，交流抗战经验，共商抗日大计。12月25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代表八路军总部向国民抗日军全体指战员宣布国民抗日军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赵侗为司令员，并筹备成立第五军分区。下辖3个总队、9个大队。此时郭方正式成了八路军的军政干部。

四

1938年3月下旬，晋察冀军区命令五支队进驻平西，建立五分区，五支队奉命驻守平西抗日根据地。

五支队到达平西后，根据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指示，5月初，派杜伯华、郭方、贾嵩明、尚英等四名领导到房山五区抗日根据地筹备建立房良联合县。郭方等人到南窖后，召开区、村干部会、知识分子会、工商界负责人会等，商讨建立房良联合县事宜。经与有关人员共商决定，将房良县政府设立在房山五区长操村王友吾家的外院。5月5日成立了中共房良联合县抗日救国会，主任是郭方。5月8日，杜伯华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宣布房良联合县政府成立，县长是杜伯华，书记是郭方。房良县委、县政府建立后，宣传《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抗日根据地很快扩大到原房山四区（河北一带）和原房山九区（霞云岭一带）。

郭方到任后，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加紧县、区、村的政权建设，唤起民众共同抗日。在地方进步人士中，特别是在进步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郭方介绍傅伯英入党，傅伯英介绍赵然、蒋维平入党，傅伯英、赵然又发展了一批农村党员。在党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抗日政策的感召下，经过郭方等同志的工作宣传，先后有 60 多名知识分子到县政府工作，壮大了抗日干部队伍。各村政府和各级抗日救国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对四区、五区的保卫团，从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进行改造，改编为平西游击四支队即房良县大队，三个大队的 400 余人布防在房良抗日前线。为壮大队伍，郭方还积极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军参战。

五

1938 年 9 月，房良县汉奸殷耀东勾结坨里日伪军二三百人向房山北沟进犯。日军在河南村建立了据点，又沿大石河谷进犯，一路烧杀抢掠。房良联合县，县政府被迫撤离长操村向山里转移，而郭方并没有一起去，被党组织秘密安排了地下工作。他以村长和商人的名义做掩护，潜伏在军事重镇坨里，开



展地下斗争。党组织让他秘密筹集粮款，支持抗战，这是郭方一项主要任务。郭方善于做群众工作，他布置的任务群众都积极完成，不仅要粮有粮，要钱有钱，群众还帮助他做了许多秘密工作，为抗日根据地运送了大量的军需物资。为了完成任务，他长年不在家，当时他有那么多能赚钱的厂子，但他家里生活并不富裕，家里的居住和日常生活条件也并不好。可见，他赚的大量钱财均上交给了共产党和八路军。他曾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困难些，打败日本鬼子之后，我们就可以和乡亲们一起过上好生活。”他平时还秘密做抗日宣传工作，教人们唱八路军歌曲。他为了给八路军和党组织筹集钱款，投资 750 块大洋与张国兴、李华民一起在门头沟开了华胜窑煤矿，在北京骡马市开大灰站，在深夜里和其他地下党去卖煤，将所做赚的钱，送到党组织和八路军手里，并且不断地将八路军所需的布、鞋、食盐、药品等生活和作战物资送到根据地。只要组织有需要，费尽千辛万苦，也要将所需送达。

为了更好地在敌后进行地下工作，他当了坨里村的村长，有了这个村长作为掩护，郭方可以很容易地接近日军和伪军的军官。他利用自己各方面的关系与日本人和日伪军交往，一次又一次将情报获取，成功传送到党和八路军手中。一次，得知日军要进山对根据地扫荡，为了获取准确的时间、进山的路线、兵力情况，郭方正就带着二女儿出去侦探，路上正好遇到日军军官。为了方便，他将女儿放在路边的大树下，就请日军军官喝酒去了。孩子在大树下足足等了一下午，最终，郭



方获取了军事情报，第一时间传递了出去。得到情报后，八路军及根据地的百姓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另外，郭方因做买卖，是坨里村的有钱人。他经常花钱买通日军和伪军的军官，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想方设法将情况传递出去。当时，郝少尧的爱人就是情报员，她直接与郭方联系。为了安全，他将情报放到郝少尧爱人扎辫子的红布条里，过大石河时又将情报放到马鞍子的缝隙里，确保各类情报平安送到八路军手里。

六

当时，国民党对郭方当伪村长，又亲近共产党的行为恨之入骨，多次想杀害他，但是一直有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保护，特务们才没有得逞。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窃取了胜利果实，接管了坨里这个交通、经济、军事战略位置重要的地方，这里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他们要寻机杀害郭方。于是，国民党特务日日跟踪郭方。

1945年9月，为了抓捕郭方，秦凤恩和郑石桥向当时的伪县长李仲三写了三封呈子和七封黑信，说郭方是共产党安插在坨里的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应立即逮捕法办。有一天，郭方和两名地下党员将日本溃败时留下的煤炭秘密地卖了，并将赚



的钱送到了八路军手中。国民党特务对郭方的行为怀恨在心，几次围堵都被郭方机智的躲过，特务们加强了对他的监视跟踪。在一次开会时，特务们知道他会后将回家，晚上11点左右，特务用黑毛巾蒙着脸，将他家层层包围，等郭方回来实施抓捕。这时，有一个特务弄出了声响，惊动了郭方的母亲。以为是来了小偷，出来查看，正好看见蒙面的特务。特务们见已暴露，像豺狼虎豹一般破门而入，将正在睡觉的郭方弟弟抓住，正要带走，郭方从外面回来了。在这之前，有好友就悄悄告诉郭方，说敌人要抓他，让他进山躲一躲，郭方顾及战友和家人的安全。他知道，国民党特务抓不到他，肯定会伤害他的战友和家人。他开会回来一看房前屋后有人影晃动，知道特务围了他的家，想到老母和妻儿，他毅然决然冲进院子。见到特务们已绑了他的弟弟，郭方毫不畏惧，厉声说道：“你们抓的是我，事情与我的家人毫不相干，把他放了！我跟你们走！”

郭方一身豪气，圆睁怒目，大义凛然。特务们万没有想到，郭方会有胆量在这时冲进来。见状，急忙放开了弟弟，然后蜂拥而上，将郭方按倒在地，五花大绑将他捆了起来，特务们嘴里还不停地说道：“终于抓住你了！可以领赏了！”

特务们又搜查了每间屋子，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见都是老人、妇女和女孩子，嘴里还说：“看看，有没有男孩子，有男孩就将他劈了，以免日后报仇。”

农历九月十二的晚上12点多，郭方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王大进、张凤姿和郑含明等抓走了。夜里，就捆在沙窝村里庙



门前的一棵大树上。将他吊起来，拿鞭子抽，往身上泼凉水，用刀刺，严刑拷问，想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些共产党的情报。但郭方咬紧牙关，宁死也不泄露党的秘密。特务们折腾了半宿，毫无收获。

第二天，特务们又将郭方押送到羊头岗，在羊头岗，郭方受到更严酷的折磨。之后，又把他带到了房山城。在监狱里，特务们使用了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逼迫郭方招出共产党的秘密，说出同伴的名字。他面对敌人毫无惧色，痛苦之中还在怒斥着这些无耻的打手：“你们这些禽兽，打日本鬼子时，你们躲得远远的，面对自己的同胞，你们心狠手辣。共产党员的骨头是硬的，你们甭想让我屈服！”

他们见用尽各种酷刑也摧不毁郭方的意志，就决定杀害他。

第三天，是农历九月十四，郭方被重新押回了坨里。在寒冷的天气里，郭方光着膀子，五花大绑，背上插着牌子，特务们往他的身上泼着凉水，在坨里村里游街示众。他虽然遍体鳞伤，满脸血迹，但依然是昂首挺胸，步履坚定，威风凛凛，浩气冲天，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游完街之后，特务们将郭方和另外两名八路军战士带到大苑上村口。在枪毙之前，特务第二中队队长、监斩官李重山（李重山是郭方的拜把子兄弟）又一次威胁说：“郭方，你就不怕死吗？只要你低头认罪，供出你的同伙，招出地下党组织的其他人员，写个投降书，兄弟我就可免你一死。”说完还露出一丝冷笑。

郭方对他轻蔑一瞥，训斥道：“李重山，好你个不仁不义



的东西！光明大道你不走，非要与人民为敌，杀共产党员，你杀拜把子兄弟，天理不容，共产党早晚要向你讨还血债！”

郭方宁死不屈，李重山气急败坏，就下令开枪。先是杀害了一名同刑的战士，又问郭方：“你招不招，不招，我再杀一个！”李重山恶狠狠地盯着郭方。

郭方还是一个字未说。李重山又下令开枪，杀害了另一名战士，用这种狠毒的方式逼迫郭方。但郭方还是紧咬牙关，说道：“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我们是为共产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人民群众会永远记住我们的。”

李重山见他如此坚强，自己颜面尽失，就下令枪毙郭方。郭方丝毫没有畏惧，挺胸抬头，两眼圆睁，射出两道寒光，刺向李重山和特务们。李重山怒冲冲地喊道：“转过身去，准备受死。”李重山不敢直视郭方的双眼。

“我是为民族的解放、为人民的幸福而牺牲的，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绝不能在背后挨枪子！你们就面对着我开枪吧！我不会眨一下眼睛。”

郭方魁梧的身躯，就像一座巍峨的山峰耸立在大苑上村口，任寒风撕咬着他布满鲜血的肌肤，浩然正气激荡着这片土地。共产党员的光辉映红了田野、村庄，郭方用激昂的声音高呼着：“乡亲们，共产党、八路军一定会打回来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特务的枪声响了，只见郭方的头被炸开了，他面目全非，死得非常惨烈，当时只有38岁。就这样，中共房良联合县抗



日救国会主任、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位县委书记郭方，死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之下。和郭方一起牺牲的战士分别是班各庄村的安进西和陈家台村的马向山，这两人在解放区工作，当时就被迫认为烈士。由于郭方当时在国统区，是秘密地下党员，属情况特殊，没有及时定为烈士，只做了临时安排，致使他的英雄事迹鲜为人知。

1945年郭方牺牲后的一天夜里，家里来了很多的头扎白毛巾的人。其中有两个人：一个人是郝少尧，当时是县长，河北镇檀木港人；另一人是郭睿，当时是区长，后任保定河北大学党委书记。他们来接郭方全家人去解放区，安排烈士家属，供孩子上学，从衣食住行上照顾他们。当时郭方的父亲没让一家人去，他高风亮节，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郭方牺牲时，爱人吴德荣 37 岁，大女儿郭淑珍 17 岁、二女儿郭淑芬 10 岁、三女儿郭淑昆 7 岁、小女儿郭淑君才 6 个月。他们一家人生活非常困难，得到了一些知情人的照顾。新中国成立后，村里都知道郭方的英雄事迹，纷纷给予关心。后来，在二女儿郭淑芬和郝少尧、郭睿、张令德（房山县县长）、隗永忠（房山县民政局局长）、白代雪（周口店公社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于 1976 年为其补发了烈士证。期盼了 30 多年的烈士证，是对牺牲的地下工作者郭方及家人最大的安慰，“迟到”的证书，让人感动落泪。

2019 年 9 月 3 日，在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到来之际，郭方的小女儿郭淑君以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烈士子女身份，受邀参加



在人民大会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4周年座谈会。



郭淑君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4周年座谈会



烈士亲友参观
房良联合县政府纪念馆



保持革命本色 老实低调做人

——记张耀峰同志的人生历程

龚 荣*

亿万革命者和热血战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赶走了外来侵略者，受到人民的景仰，名列英雄史册。这里，笔者记述的是一位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老革命的低调人生。

战场立功

张耀锋，1925年出生于河北省海兴县孔庄子村。小时候在村里读过三冬的书。农忙时和哥哥们帮父亲到地里去干农活儿，是个诚实正直的孩子。

1938—1940年，张耀峰参加了当地组织的青抗宣传队和抗日救国团，手握红缨枪，站岗、放哨、巡视。

1941年，八路军抗日队伍在张耀峰家乡活动频繁。张耀

* 龚 荣：原北京市窦店砖瓦厂党委宣传部长



峰抓住机会，主动找到抗日部队的领导，要求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

部队领导看他还是个年仅16岁的孩子，个儿又矮，有些犹豫地说：“你这点儿小个儿，可有问题。”张耀峰急了，语气坚定地说：“我拿不了大枪，拿小枪。拿小枪也要和你们一起去打鬼子。”后经过部队领导反复磋商，



同意了张耀峰的请求。他和当地二十几名热血青年，就这样编入了邓华领导的115师独立团六旅十三团，成了一名抗日战士。

张耀峰参军后第一仗是打黄骅县杨二庄。从早上八点打到晚八点，战斗非常激烈。战斗取得了胜利，缴获了一挺重机枪，200多支步枪，抓了200多个俘虏。张耀峰所在的二连伤亡过半，教导员王同文壮烈牺牲。

接着，又攻打小山南的魏庄村。为了攻上城墙，我一营二连战士搭人梯上墙，杀死了守城之敌，缴获一挺重机枪，击毙日伪军10余人，战斗取得了胜利。

当时的张耀峰，童稚犹存，又是个小个儿，不善于辞令，但打起仗来，勇敢机智，毫不退缩。

1942年下半年，经上级批准从16团1营各连抽调30名战士，由1营韩营长带队在庆云县、阳信县成立了武工队，武工队主



要任务是保护庆云县、阳信县的县委同志，协同两县地方武装对敌作战。武工队成立后，在敌占区进行过多次战斗，在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的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张耀峰也被抽调到武工队。1944年1月27日，敌人突然把武工队与县委领导所在的庆云县王高村包围了，当时日伪军有60多名，武工队只有30多名，武工队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正在双方激战时，日军又增派了200多名骑兵部队，敌众我寡，武工队领导决定，一半同志保护县委干部安全转移，张耀峰和另一半同志负责掩护，在村东、南、北战壕奋力阻击敌人。经过激烈的战斗，县委干部都安全转移。

在这次战斗中，武工队伤亡10多人，张耀峰不幸左胳膊肘中弹，造成粉碎性骨折，当时昏倒在战场上。当他醒来时部队已经转移。他和刚苏醒过来的另外4名同志，相互搀扶着到了附近的李赤城村，村里一位大娘给他们做了面条吃，吃完饭当晚村里又把他们分送到各村住下。

张耀峰被送到阳信县铁家营村，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村里把他们安置在一个草棚里住下，派一位大哥每天爬墙过来给送吃送喝，又请村里的兽医对张耀峰的伤口用盐水进行了简单的处理。五天以后又被部队安排到庆云县养伤，住在西左耳庄村胡大娘家。

由于张耀峰受伤的胳膊伤口已化脓，部队医生为他进行了手术，取出了一些碎骨头片，之后张耀峰继续住在胡大娘家养伤。

在西左耳庄村还有几名八路军的伤病员养伤，张耀峰与几



位战友都认识，常凑到一起聊天。有一天，张耀峰正在胡大娘家的堂屋聊天，胡大娘突然跑回来说：“鬼子来了，你们快跑吧！”

其他几位战友伤势较轻，听胡大娘一说，赶紧跑了出去。胡大娘对张耀峰说：“鬼子来了，你怎么不跑？”由于张耀峰伤的比较重，左胳膊还吊着绷带，他对大娘说，大娘我跑不了啊！胡大娘拉着胡耀峰来到院子里，房子东墙与邻居家房子之间有一个夹壁墙，平时外面放着一些高粱秸。胡大娘迅速把高粱秸挪开，让张耀峰赶紧到夹壁墙里边躲起来。一会儿，鬼子到大娘家搜捕八路军的伤病员，搜了半天，没有找到就走了。过了一会儿，胡大娘又从外面跑了回来，告诉张耀峰：“鬼子们走了，你快走吧！”张耀峰从胡大娘家出来后，慢慢地向村东走去，在村外碰上了正在来找伤病员的部队医院的同志，这样张耀峰到了部队野战医院，住院进行治疗。

由于胡大娘的机智勇敢相救，张耀峰才幸免于难。张耀峰对胡大娘感恩不尽，重情重义的他认了胡大娘为干娘。在张耀峰走上工作岗位后，经常去西左耳庄看望干娘，年年寄款、寄物。在干娘去世后，每年清明节，都要亲自回老家为干娘扫墓。张耀峰 92 岁那年，虽身体不便，但还是回去了。之后，每年都嘱托自己的儿女回老家专程为干奶奶扫墓，数年不断。

张耀峰受伤的左胳膊肘，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在部队医院养伤时，受伤的左臂，逐渐发黑，重度感染。经战地医院医生诊断认为必须截肢，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过了几天，张耀峰的左臂，既肿胀又发黑的肌肉，居然奇迹般地泛出了可喜的微红。又过了几天，肿胀竟然慢慢消退，左臂保住了。张耀峰这年刚满 20 岁，年轻的他又躲过了一劫。

张耀峰的老父亲闻知儿子在打仗负伤后，心情十分焦急。摸黑步行 100 多里到了部队医院。见到张耀峰说道：“耀峰啊，你伤得这么重，也打不了仗了，跟我回家吧！”可张耀峰态度坚决地说：“我拿不了大枪，就拿小枪，打不走鬼子，我不回家！”老父亲力劝无效，第二天，只好独自离开了部队。

张耀峰自从参加革命以后，至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直在八路军野战部队的前沿。在抗日战争中，曾先后参加了攻打黄骅、无棣、庆云、阳信、海兴、小山等多次战斗。

1946 年 7 月 1 日，经吴宝华、巩振华介绍，张耀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伤残的原因，1947 年 2 月，部队首长让张耀峰到山东兵团卫生学院学医。开始，张耀峰还有顾虑，说：“自己文化低能成吗？”首长说：“你爱学习，边学习边工作嘛。”从卫生学院毕业后，他被分到疗养院当护士，1948 年又派他到山东青州白求恩医干校学习。因此，张耀峰的医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济南战役中，张耀峰带着伤残的胳膊与重伤员救护队的同志们，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在战场上奋力抢救受伤的战友们。由于张耀峰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受到部队首长的多次表彰。

在解放战争中，张耀峰随所在野战部队，先后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及渡江战役。



张耀峰获立特等功奖状



国家和部队颁发给张耀峰的不同时期的部分纪念章

张耀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参加过 80 多次战斗。由于他在战斗中机智，勇敢，表现突出，深得多位部队首长的好评，并屡立战功。1947 年，在渤海一分区荣立三等功一次，特等功一次；1948 年，在渤海一分区卫生所荣立二等功一次；1949 年，在华东后勤警卫营荣立四等功一次；1950 年在华东后勤军械部二总库又荣立四等功一次。

根据部队的安排，张耀峰于 1952 年转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砖厂从医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规划要建设十大建筑，必须有大量的黏土砖和瓦。为此，国家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156 项重点工程。其中一项就是斥巨资建设一座大型砖瓦厂。

京广铁窦店车站东侧一大片土地的土质上乘，符合制造



黏土砖瓦的技术指标，北京市决定建一座“北京市窦店砖瓦厂”。因此，张耀峰和家乡的十几个农民，于1953年来到窦店砖瓦厂，成了一名工人。

砖瓦厂占地3451亩，年产黏土砖一亿多块，高峰时期，有职工四千多人。在当时不论从技术上和规模上看，是亚洲乃至世界第一大砖瓦厂。

张耀峰在生产一线干了几个月的活儿，厂领导得知张耀峰左臂曾在战场负过伤，立过多次战功，又有不俗的医术，于是就调他到了厂医务室，成了一名医生。

从医，对张耀峰来说，已经干过多年，轻车熟路。事业心很强的他，对这个工作非常满意，工作认真负责。他身挎红“十”字标志的皮药箱，经常深入车间、宿舍，为工人和家属开药、打针。

偌大的一个砖瓦厂，工人们经常能看到张耀峰的身影。在全厂干部、工人眼中，张耀峰总是那么和和气气的，面带笑容，从没见过他以老革命和曾在战场上屡立战功而自居。张耀峰由于在战场上耳朵被炮弹震得听力下降，厂里的人并不了解这一情况，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张聋子”，可他并不计较这些。

那时的窦店砖瓦厂，每年抽出一部分资金，增盖职工家属宿舍，但很难满足需求。于是厂领导决定，允许双职工到最近的大小高舍村去租住民房。张耀峰与其他几十名职工曾在高舍村租住民房一年，他与当地百姓关系融洽，有时，深夜有急病号，



张耀峰挎起药箱就出发，一年四季，在附近的几个村中都能见到张耀峰的身影。

当地百姓都知道张耀峰是老革命，打过仗，立过功，可他从未在众人面前标榜自己，因而深得当地百姓的尊敬与信赖。

有一次，老厂长江明波到医务室去看病，看到张耀峰在给一名职工静脉注射，打完第一针之后，不拔针头，接着就注射第二针。江厂长觉得很新鲜，于是问张耀峰，这是为什么？张耀峰很明确地说，不拔针头继续注射，也就是说，少给患者扎一针，让患者减少一次扎针的疼痛。江厂长十分赞赏张耀峰这种处处为患者着想



张耀峰在给患者打针

的可贵医德，并号召全厂医务工作者，要好好地向张耀峰学习。

张耀峰在窦店砖瓦厂医务岗位上干了30多年。1985年，光荣离休。离休之后，张耀峰本可以享享清福，可他总是闲不下来，身体虽不那么健壮，但总是那么精神饱满，从早忙到晚。一方面，他时常为邻里做好事；另一方面，他十分关心和惦念家乡的发展。

2008年，曾为家乡孔庄子中心学校捐赠文具、办公用品等。该校专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并送锦旗。在大会上，张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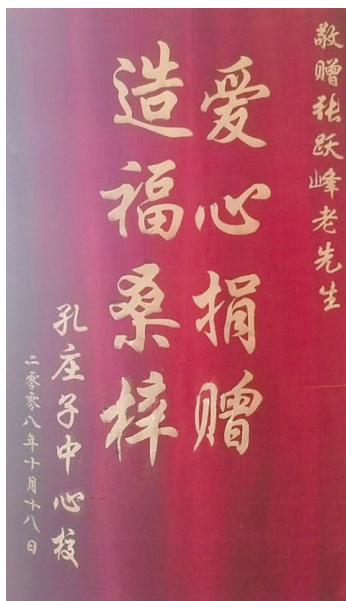


峰还为全校师生讲了革命史，进行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2011年10月，张耀峰还为家乡盐山县阜德医院捐赠了价值20000元的医疗器械。对于这些，张耀峰总是三缄其口，从不在众人面前透露出一个字。

张耀峰，以他谦虚谨慎，有功不居的低调姿态，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多年以来，他有句口头禅：“我的很多战友为革命事业付出了一切，我还活在世上，我也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献给祖国，献给人民。”

在全厂职工和家属心中，张耀峰总是乐呵呵的，低调的，平而不庸。从来没见过张耀峰在大庭广众之中炫耀过自己是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数次立过功的老革命。

2019年，张耀峰曾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孔庄子中心学校送给
张耀峰的锦旗



河东小学第一任老师——殷秀芳

周学英^{*}

房山区境内的河套沟（今称北沟），自坨里进山至霞云岭，全长 100 多华里。发源于霞云岭堂上的大石河，自西向东蜿蜒流淌，当河水流入河北镇东庄子村北时，遇山则折转向南，河道呈南北向，河东岸的村庄称河东村，河西岸的村庄叫河西村（今东庄子）。新中国成立前，两村为一个村，名河西，元以前成村，建学校较早。河东村明以前成村，晚于河西且无学校，故河东村的儿童要到河西小学读书。昔日，每逢 7 月底 8 月初汛期来临，大石河怒发洪水，波涛汹涌的河水将两岸隔开，河东的孩子在岸边踱来踱去，望着一河之隔的学校不能上学，只好“望河兴叹”。

1942 年春，为使孩子能安全顺利地到校安心读书，河东村民殷春田率先倡议建一所村办小学。当时，小山村只有 100 多口人，这一善举得到村民的支持和响应，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的为建校捐钱，有的捐物，无钱无物出人力。此

^{*} 周学英：房山区河北镇河东村原党支部书记



时，日本鬼子占领我河套沟疯狂实行“三光”和“里不出外不进”的经济封锁政策，加之又遇旱灾，因而，战乱、灾荒、饥馑，百姓苦不堪言。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村民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历经半月时间，举全村之力，在村后 30 米高 45 度的半山坡上，5 间宽敞明亮、土石木结构的校舍拔地而起。经过陆续地装修、制作门窗、桌椅板凳以及修建厕所和建操场等，小学校于年底大工告竣，学校起名“官学房”。昔日，曾参加义务劳动建校的村民吕德文，自编顺口溜：“河东村民志气大，千辛万苦踩脚下，齐心协力建学校，孩子在村有学上”。

1943 年春节后，官学房正式开学，第一任老师殷秀芳。殷老师毕业于河北省立通县女子师范学校，当时 20 岁左右，身材苗条，圆脸庞，皮肤白皙，一头乌黑的短发，一双大眼睛晶莹剔透，是一个即有知识又有文化的漂亮姑娘。

殷老师全家 7 口人，家境殷实，姊妹 5 人，排行老大。其父殷宗夏，别号景纯，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任潞河中学校京兆师范教员。常年在教书。在村东与本村一河之隔的干河（今属三福村）有少量的耕地和菜园子租给他人。其母待人热情，善良、干净又很秀气。

殷老师热爱家乡，热爱本职工作，对在本村教书感到自豪，从担任老师始，便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

殷老师任教初始，学校只有 10 来个学生。当时，日本鬼子经常进攻解放区，搜捕杀害八路军和村干部。村民东躲西藏，社会很不稳定。那时，村民遇到旱灾，不少户背井离乡外出要饭。



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村民，供不起孩子上学，有的孩子入学一段时间后，因交不起学费便不再上学，特别是孩子多的家庭，只留一个继续念书。七八岁便随父母下地干活儿，维持生计。因此，家长对孩子上学念书意识不强。殷老师为提高入学率，利用闲暇时间走街串户，进行家访，征求意见，询问孩子学习情况，鼓励家长支持孩子上学。真心实意地劝导，耐心细致做工作，并尽量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如石景山区模式口村商贩来校卖石笔，为少花钱，不买成条而买成块的，鼓励孩子自己动手拉；收学费按最低标准一学期只收1块钱绿色的大核桃叶日本票子。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上学的孩子渐多，截至1945年冬，学生达到20人。

“官学房”共5间北房，中间3间为教室，西朝间1间与教室相通，是里外屋，为老师办公室和宿舍。东朝间1间单拉门口，是学校库房，也是工友住所。

当时，因为村子小学生少，一个年级只有几个人，只能采取复式教学，给一个年级讲完，再给另一个年级讲。学生入学后念国语、算术、修身三本书。字是繁体字，笔画多不好写，教简单易写的字，如上下左右大小等字，随着年级的增加，逐步书写笔画多难写的字，如“隻、個、農”等。用石笔写在石板上，老师批改。国语课本里有故事，殷老师对入学的新生常讲“狼的故事”，讲完故事说：“狼终归是狼，本性凶残，不知恩图报，反而恩将仇报。我们做人要积德行善做好事。”

修身，也是必学的一门功课。殷老师讲：“修身就是修德，



对每个学生都很重要，做什么事都要勤奋要坚持。”还说，“修身要保持身体健康。”讲如何保护眼、耳、鼻等五官。

学习书法，也是殷老师教的一门课程。老师从房山书店购回印好的大仿范本，发给同学。因家乡出产文化板和青石砚，只需学生购买毛笔和墨，“描红模子”。

殷老师在校期间，每天都要上体育课。上体育课没体育器材，就在操场上练习排队、稍息、立正、向左向右向后转，以及走步跑步等。殷老师说：“你们看过村里的民兵，排队出操动作快又整齐，喊号洪亮有力量，你们要向他们学习，上好体育课，锻炼身体，长大练好杀敌本领，保卫家乡。”

殷老师认为管好学生是自己的义务，所以，对学生管教非常严格，在学生中的印象她是严厉的，不论男生女生都怕她。

1944年下半年的一天，河东小学来了三位不速之客，两名日本兵挎着上刺刀的枪，陪伴一个消瘦、个头不高的人进了教室。日本兵哇啦哇啦一顿后，从口袋里掏出块糖给孩子们说：咪西咪西的有，孩子们听不懂，都不要不吃。矮个子是日本翻译官，坨里村人，姓苗名培根。他说：“刚才皇军说了，我们是友好的，来帮助你们的，皇军让我教你们日语，你们要好好学习……”这位翻译官受日本派遣，来学校教日语，实际上是日本在河套沟地区推行奴化教育，贯彻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对当地人民实施精神控制。苗翻译秉承主子的旨意，对学校里的儿童进行奴化教育，要孩子们学习日语。殷老师不屑一顾，态度不卑不亢。学生听不懂，也不愿学。殷老师对学



生说：“他们再来，你们能躲就躲能藏就藏。”后来，翻译官一露面，有的跑出教室，有的藏在门后，还有的藏在桌子底下。苗翻译官来了几次，教不下去，不再来了。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翌年春，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有效打击日伪投降派和汉奸恶霸的嚣张气焰，良乡县政府决定3月5日在佛子庄乡黑龙关村外大河滩召开万人大会，清算斗争河南伪大边乡乡长张定宇和大恶霸马金生（马大兜）。

殷老师接到上级通知：“3月5日上午，在黑龙关召开万人参加的清算斗争大会，你校老师务必带10名年龄较大和个头较高的学生按时参加大会，因路途较远且山路、河滩路难行，参加大会的人又多，途中照顾好学生，注意安全……”让老师和学生参加这样的会，是对师生进行革命斗争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好形式。殷老师接到通知后非常兴奋，按通知精神，挑选了段维兰、王德荣、张启刚等10名同学参加。为参加大会，殷老师还自己作词作曲编了一首歌，准备在大会期间让学生演唱。

3月5日，农历二月初二，是黑龙关龙神庙祭祀求雨的日子，天刚亮，方圆近百里的百姓相继来赶庙会，附近十里八村的花会在庙会上竞相献艺，北窖村的评剧团登台演戏。庙会、清算斗争大会（又称公审大会），两会同时进行，交织一起，平日空旷的大河滩，人头攒动，一时间锣鼓喧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巳时许，公审大会开始，两名罪犯被荷枪实弹的军人押上主席台。霎时，打倒汉奸张定宇！打倒恶霸马金生！振聋发



聒的口号声响成一片，殷老师带的10名同学参与其中，一起喊口号，两名群众先后上台控诉其罪行。

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盘踞在坨里的地主、恶霸、汉奸等残余势力组成八大队，（国民党还乡团）当地人称“白箍儿”。数百人的反动武装，十分凶残，经常进攻河套沟解放区。抓人放火，搜捕杀害我地下工作者及民兵、村干部。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广大人民群众恨之入骨。进入9月，天气渐凉，这一天，白箍儿又进攻解放区，民兵、村干部和群众藏好东西进山沟隐蔽。白箍儿很快占领了村前南山马仙洞山尖制高点，对准小山村打枪放炮，突然，一发炮弹落入村东一住户院中，轰一声巨响，炮弹爆炸，弹片隔着门帘飞进屋里，将一老太太炸伤血流不止。这个被炸成重伤的老太太就是殷老师的母亲。殷老师的学生段维兰，目睹了老人被炸的悲惨场景，段维兰说：“殷老师和几个妹妹抱着母亲哭天号地，痛骂国民党，痛骂白箍儿没有人性……”

殷老师教书育人四年，虽说时间不长，却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和国民党发动内战两个时期，处在战乱、兵祸、社会不稳定及百姓生活极度贫困中，仍把教书看作是自己的神圣职责，把立德树人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她不苟言笑，一向严肃认真，严格管教学生。

受父亲影响，殷老师酷爱学习，喜读书，学生爱听老师讲书中的故事。通过讲故事把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

殷老师后来供职于房山某小学，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工农区教育系统的市劳模

朱祥秋^{*}

20 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房山县辖区内的大安山、安子、房山和长沟峪四座煤矿，均属原北京矿务局（京煤集团）。在给国家开采了大量煤炭能源的同时，也造成了相应地面的明显下沉，直接导致大安山、史家营、南窖、东班各庄（佛子庄）、河北等公社及周口店公社部分村被列为采空区。

1981 年 1 月，这些采空区由北京矿务局接管，成立了北京矿务局工农区办事处，办公点设在河北村，直至 1993 年归回房山区。

在成立北京矿务局工农区半年后，家住东班各庄公社陈家台村的李爱民就从房山师范毕业，被分配到离家十多里之外的陈家坟小学当老师。

陈家坟小学地处一个深山沟里，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只有极少数来自大安山矿的矿工子弟。尽管他们是极少数，但在班里他们属于不好管理的学生。

^{*} 朱祥秋：房山区佛子庄乡学校教师



在那个年代，他们就相当于今天的所谓“富二代”。那时煤炭是香饽饽。不管煤炭是供不应求，还是求不供应，作为大安山矿销煤处的职工都能凭借国营大矿的优势挣钱多，自然花得大方。学生们的生活水平高过周边的孩子。生活过分安逸，受家长潜移默化的“学好学坏无所谓”观念的影响，孩子们不求上进，而且还感觉自己高高在上，霸道，唯我独尊。

当时已有人私下提醒李爱民不要接手毕业班，因为班里矿工子弟太多。特别是号称“五虎”的五个孩子，把毕业班搞得鸡犬不宁。

但当校长开诚布公地跟他谈工作时，他还是毅然接手了这个班。校长最后对他说：“这个班你尽力就行了，只要不出大乱子，就万事大吉了。”

李爱民在上师范之前代过几年的课，他听得出校长对他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在当时小学毕业考试进行大排名的现实情况下，相当于自己自愿给其他人当垫底了。

他只是说了一句：“校长，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当时，校长听了，只是轻轻一笑，拍拍他的肩膀走了。

别人在背后都笑李爱民傻，不知天高地厚，不知自己几斤几两。而他憋着一股劲，走马上任了。

可当他真的走进课堂，心里还是凉了半截：都上课半天了，班里却没有一个男生。他正在纳闷时，门口传来异口同声的“报告”声，他知道这是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在探他的底。

于是，他很随意地说了一声“请进”，连看都没看他们一



眼，继续不停手地擦着被写得乱七八糟的黑板。

故意迟到的男生们只好悻悻地胡乱坐到位子上，继续挑战他。而他扬了扬手里的座次表，笑着说：“虽然你们没按往常的位子坐，但我还是能一一叫出你们的名字。”

“老师，您吹那吧，谁相信啊。”被称为大虎的孩子开始挑事了，其他孩子随之哄堂大笑。

“那我要是能叫出你们的名字呢？……”

“我们自然听你的。”被称为大虎的孩子抢着说。

李爱民笑着走到大虎跟前说：“你叫大虎，对吧。”被叫大虎的孩子先是一愣，然后尴尬地一笑，默认了。

在不断地惊讶中，李爱民叫出了每个孩子的名字。此时五虎佩服得都忘了继续挖他们早就设计好的坑儿。在剩下的时间里，李爱民坐在中间，学生围在他的身边，听他讲母校房山师范和房山县城。不知不觉中下课了，学生们意犹未尽。特别是五虎，非要缠着他，让他继续讲。

李爱民适时提出条件：“同样，你们也要好好上其他老师的课，想听什么都给你们讲。”五虎虽然心里有些不情愿，不想轻易受人摆布，但面对这个虽然长得高高大大，但却瘦得像根棍儿的小眼睛老师，禁不住被他新奇的故事诱惑了，勉强答应了。

“说话算话。我可要检查的。”

“我们是不讲信用的人吗？”

李爱民听了，心里暗乐：一个星期的功课没白做。



初战告捷，让李爱民信心大增。也让在旁边给他捏了一把汗的校长松了一口气，庆幸没看走眼。

外面精彩的世界让五虎和其他孩子感到新奇、向往，李爱民就继续抓住时机，趁热打铁，告诉他们：“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将来就能走出大山，去房山，去北京，看到比老师讲得更精彩的世界。”

一石激起千层浪，孩子们个个开始拼命学习。心里想着学习，就没有了其他闲事。李爱民开始想方设法给班里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吃小灶，特别是五虎，他们已从厌学到想学，有了质的飞跃，但毕竟之前的基础太差了。

李爱民首先树立五个孩子的信心，对他们的点滴进步都大大给予表扬和鼓励，然后根据每个孩子的功课水平，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辅导。

这样一来，白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他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走老远的山路到学生家里去辅导。

望着他更瘦弱的身子，家长都不忍让他再补下去。他却笑笑说：“看着孩子们一天天进步，我就感觉不到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实际上他每次摸黑从学生家里补完课回到学校的宿办室，累得躺下就不想起来。但为了把明天的课上好，他总是备课到深夜。

全身心付出，就会有出人意料的惊喜。李爱民参加工作教的第一个毕业班，在全工农区小学毕业升学统考中名列第一。



外校的老师根本不相信他一个初登讲台的新教师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都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当时的东班各庄学区的领导在欣喜之余，心里也没底。就在转年李爱民又接手了一个毕业班后，校领导在陈家坟小学他的班里蹲班跟课半个月，才放心地离去。

一炮走红，慕名请教的人越来越多。他从不掖着藏着，总是把自己能教学生的东西都全盘托出。有时看到别人质疑的目光，他也一笑了之。

那一年又获得工农区小学毕业升学统考第一名，学区领导点名让他继续教毕业班。

管班和上课，对李爱民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这期间，女儿出生了，这让他无论多晚，都必须回家，因为爱人和孩子还等着他回去照顾。

为此，他多方筹钱，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尽量减少在上班路上耽误的时间。

虽然他努力做个好丈夫，好爸爸，但为了工作，为了学生，他自己都觉得做得太少太少，亏欠爱人和女儿太多太多。所以他和爱人商量后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李倩（与欠同音），提醒自己永远对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好一辈子。

又是一个工农区小学毕业升学统考名列第一，北京矿务局工农区办事处的领导们在百忙当中特意来到陈家坟小学，带着教育教学的专家走进他的课堂，一番考察过后，对他大加赞赏。



他被邀请在北京矿务局工农区全体教师面前做公开课、示范课。

这一年，他再次夺得全工农区小学毕业升学统考第一名。于是，经办事处领导向北京矿务局极力推荐，1985年他最终被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政府授予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这对于李爱民来说是无上的光荣，也是实至名归。



李爱民的北京市劳动模范证书



李爱民的北京市劳动模范
奖章



随张进儒书记搞调查的回顾

李志国^{*}

1959年，我在城关大公社工作（亦称工委），张进儒同志任书记，为了全面了解全社农村社员食堂的真实情况，我陪他到周口店地区。先后去了周口村、南韩继村、车厂村和黄院村的20个生产队食堂进行实地调查，在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的同时，开了十多次调查座谈会，并对50多人进行了入户走访，此次调查从十月初至十一月中旬，40多天的时间，我们获得了不少真实的材料。

1958年随着农村集体化的发展，农村社员实现了吃饭食堂化，即：以生产队为单位办起了农村社员食堂，社员把自家的存粮全部作价交给食堂，由食堂管理。社员凭食堂发给的饭证在食堂打饭，外出食堂发给餐券，凭餐券到食堂结算。家里来亲友向食堂申请客饭。食堂成立初期，由于社员把粮食全部交给食堂，伙食很好。大米饭，白面馒头随便吃，不论大人小孩按人头领饭，于是就出现了严重浪费粮食的现象。好景不长，

^{*} 李志国：宁夏宁光电厂原党支部书记



几个月后，社员交的粮食吃光。1960年以后粮食减产，食堂随即出现了“瓜菜代”情况，社员伙食低下，剩粥、馊粥、发霉的窝头，天天有，顿顿吃。加上生产队的一些活动都通过食堂落实，如社员应参加生产队或大队召开的会议；早晨生产队组织社员跑步，由于妇女有小孩不能参加，食堂就不给饭，社员对此非常不满，把食堂取名叫“制人堂”。

食堂是解散还是继续坚持办，农村干部和社员反应十分强烈。为解决实际问题，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中共城关工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周口店地区以食堂是否继续办还是解散为主题，搞一次认真调查。于是，由工委书记张进儒亲自带队，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调查，亲见了张进儒书记那种严肃认真、全面细致，不简单从事，不轻易下结论，不光靠听汇报，真正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

1959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中，一度对一些干部和社员对农村社员食堂提出过不同意见的人，进行过不公正的批评，致使一些人背上了“少说话、莫开口、好坏不说闭眼走”的思想包袱。这就给我们这次调查带来了很大困难。起初我们召开干部和社员座谈会，尽管我们磨破嘴皮子，参会人员只说“好”“没意见”，经过几次座谈会毫无收获。走访也无功而返，对此我们非常懊恼，埋怨群众觉悟低思想落后。张进儒书记发现我们的急躁情绪后，耐心地启发我说：“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群众不表示态度，一定有原因，我们要耐心启发并找出原因，不能急躁。”经过张



进儒书记的一番开导，我纠正了不良情绪，决心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于是制定了“三三二一”的具体方法，即：坚持三同，执行三不，做到二允许、一纠正落实。

坚持三同是以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执行三不是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做到二允许是允许大家提出不同看法，允许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凡事不符合中央精神，被批评批判错了的主动纠正，并对被批评批判过的人赔礼道歉。

在调查活动中，我亲见了张进儒书记的那种认真坚持“三三二一”的作风。张进儒同志当年50岁，并有严重胃病，他不论到哪个村，都到社员食堂和社员一起吃饭，不许为他开小灶。我们第一站到周口村大队，原来准备给我们安排在大队办公室住，并安排专人为我们做饭，他当即做了纠正，亲自找到第三生产队田王氏家的闲房住下，并在这个队的食堂和社员一起吃饭，晚上和人聊到11点多。有一次正聊的有兴趣，他的胃疼起来了，我刚要给他请医生，他向我摆摆手，把我拦下了，吃几粒胃舒平后继续和社员聊天，通过聊天得到了不少真实情况。第三生产队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对张书记说：“你知道社员为什么总说‘好’不说‘不好’吗？因为都怕被说成对社会主义不满，挨批评。”我当时插了一句：“您觉得食堂到底好不好？”老太太毫无顾虑地说：“好什么呀！社员经常吃剩饭，今天晚上做多了，明天早上吃馊粥，做少了多兑水，稀的能照人，我们把它叫电影粥。社员不是吃稀粥就是吃馊粥，没一顿合适的时候，一个食堂少的二三十户百十来人吃饭，多的上百



户几百人吃饭，再加小心也没法适合大伙的口味，更何况还不那么认真。要是解散了食堂，谁的口粮归谁，自己安排吃多少做多少，干稀搭配，既不浪费粮食，还不吃剩的，领导还省心，把心操在给社员增加收入有多好啊！”

我们在南韩继村和贫农社员刘忠贵一起劳动，他见张进儒书记出了满头大汗，满脸尘土，感动地说：“张书记，您说食堂是‘好’是‘不好’？”张书记微笑着说：“我说了不算，因为我不经常在食堂吃饭，群众体会最深。”笑着反问：“你说是‘好’是‘坏’？你尽管放心，我保证不扣帽子。”刘忠贵见张书记和蔼诚恳，鼓着勇气说：“您要让我说实话，这食堂不如解散好。第一，避免粮食浪费；第二，社员不吃剩的、馊的，对人的健康有好处；第三，领导省点心，可以多考虑别的大事儿；第四，社员少受不必要的管制，上岁数的老年人在家可以得到照顾。这些请领导考虑。”两天后，张进儒书记又带我上车厂村。在劳动中一位姓刘的人对张书记说：“食堂好坏，你们待两天就看出来了，非让社员说，谁敢说实话呀！1959年我们村刘书记就因为说了一句‘食堂真不如解散好’，就这么一句话，说他对社会主义不满，在房山辩论他两天，真是冤枉。我们刘书记是二等甲残疾军人，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讲困难。虽然对他道了歉，人们还是有顾虑。要真说实话，食堂不如解散好。”综合社员的意见，我们又召开了干部座谈会，车厂村支部书记刘守文同志说：“说实话，食堂不如解散好，一个食堂几十户上百户几百人吃饭，哪能管得那么好？干部不



少操心，不少费力，不少着急，还落不了好，实在是脱离群众，弄得群众意见很大，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周口村第三食堂管理员朱友说：“我有深刻体会，因为我是直接管食堂的，一天到晚算计这点粮食，今天坐着张三的饭也没来领饭，造成剩粥；明天你没做着他的，他来领饭了，又不够吃，只能多兑水，社员只好吃稀的。这心不少操，急不少着，力气不少卖，结果是费力没讨好。食堂解散了，社员把口粮分家去，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后我们又召开了两次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食堂管理员参加的30多人次座谈会，大家见张书记的态度认真诚恳，都打消了顾虑，敞开了思想，畅所欲言，一致认为食堂解散好。这次调查给中共房山县委提供了符合实际情况、符合群众利益的科学报告。

这次随张进儒书记调查虚心倾听群众意见，我有深刻体会，学到了很多走群众路线的方法，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回忆起来倍感亲切。

注：本文口述者肖文奎，房山区周口店镇农机站原站长；
整理者李志国。



艺术大师戴洪祥

傅祥荣*

八十年前，在琉璃河畔南白村，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就开始跟着当木匠的父亲拉大锯了。他就是戴诚的父亲戴洪祥。

“ 哧——啦—— ” “ 哧——啦—— ” 这是锯木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终日响在戴洪祥的耳畔。然而这枯燥的拉锯声，犹如美妙的音律在戴洪祥的心底深深地打下了烙印。

戴洪祥渐渐长大。他不厌弃拉大锯的活计，因为祖祖辈辈都是拉大锯的。靠着拉大锯的活计，维持着一家的生活。他们为办红事打衣箱，为办白事的打棺木；高超的手艺在当地远近闻名；精益求精的木匠精神也给他们带来尊严。

但是，少年戴洪祥的心渐渐地高了，他向父亲提出要去读书。父亲准了，靠着娴熟的木匠手艺，家中积攒了几个钱，但读书之余还要拉锯。读了几年私塾之后，戴洪祥的心更高了，他想见更大的世面。后经人介绍，他来到了北平建国门外一个叫大北窑的地方。那里有个古琴作坊，聚集了一些做精细活儿

* 傅祥荣：中国消防协会原副秘书长



的木工匠人。

在那里，他是小字辈儿。人家嫌他年少，艺恐不精，依旧让他去拉大锯，干粗活儿。这对戴洪祥来说，不算个事儿。但这里与家里不同的是人多、热闹，手艺高的师傅多，他喜欢这里。

去了北平城，还是拉大锯；“还是回来吧……”父亲说。

戴洪祥有自己的主意——琉璃河虽好，但永定河更宽；南白村虽亲，但大北窑更大。在那里，匠人多，能学艺；拉大锯，也愿意。他在大北窑待下去了。

他看到作坊里有几位年长的师傅，在做一种像扁葫芦一样的东西。他感到很新奇，边聊天儿，边看他们做活儿。师傅们见这小伙子聪明灵巧、勤快好学，也越来越喜欢。人熟了，话自然也就多了。师傅们告诉他，这玩意儿不是什么扁葫芦，而是一种来自西洋的乐器，叫小提琴，很有讲究，西方人都喜欢。传到咱们东方后，也有很多人喜欢，所以咱们就试着做……

“那我也来这干行吗？”

回答说：“不行，你年轻，没学过这门手艺，还是去拉大锯吧……”

哪知师傅们说的无意，但戴洪祥听得用心。把有用的话，有用的事儿全都暗暗记下来了。

就是古人说的偷艺？他们木匠的祖师爷鲁班小时候就是这么学艺的……凡事都需用心，不用心，难成器。

回到住处，戴洪祥便开始自钻，学着做起琴来。他越做越



上瘾，越不会越想学。常常琢磨到深夜，一干就是半宿。

一个多月后，他用边角余料，制作了一把“小提琴”拿给师傅们去指点。师傅们看了后大吃一惊，对他说：“这不是你做的。你是从哪儿拿来的？”戴洪祥怯怯地说：“真是我做的。”“你又没学过，怎么会做呢？”“都是你们教的。白天听你们说了，我晚上就学着做。看着你们做，我就回去琢磨。一来二去就做了这么个东西。不像样儿，让师傅们笑话了……”

师傅们更加喜欢他了——“上这儿来吧，别拉锯了，咱们一起做琴……”

师傅们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从此，戴洪祥不拉大锯了。

“你做的那玩意儿，虽然不错，活儿很细致，但那还不叫琴，只能叫扁葫芦或木箱子。里边儿还缺东西，没有音柱，没有低音梁……发不出好听的声音。你只是学了皮毛，未通其里（理）。要想学艺，日子还长着呢。做个好工匠，那是一辈子的事……”

戴洪祥听了师傅的话，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他暗下决心，立下了远大的志向。

1949年，10月1日那天，全城沸腾了。

这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从此，北平城改称北京。琴作坊也有了新名称：北京乐器厂。戴洪祥感觉自己身心都变了，换成了新人。兴奋之时，他和师傅们终日劳作的作坊里，拉响了他们亲手做成的提琴。用西洋乐器，奏出了最美的东方乐曲——《东方红》，那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



的音乐会，心弦与琴弦的和声构成最动听的音响，在这个琴作坊里产生着共鸣。

戴洪祥的人生进入新的阶段。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新社会，新事多，好事多。这给戴洪祥和他的师傅们带来的首先是精神的振奋。为了建设新中国，他们奋发图强，生产蒸蒸日上。个人的技艺得到充分的发挥，提琴制作的水平不断提高。

一天，厂里来了一位音乐大师。他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谭教授。他把北京乐器厂制作的小提琴试了一把又一把，认为制作水平很高，但也同时提出了许多建议。

大师走后，厂里为了进一步完善提琴制作工艺，提高制作水平，选派年轻且有文化的戴洪祥去上海学习。

在上海这个东方大都会，戴洪祥学习了一个多月。他多次向谭教授请教，还参观了上海的乐器厂，走访了艺术团，眼界大开。对小提琴的历史、制作工艺、用材要求、名琴名家的分布了解得更多更全了。

戴洪祥从上海回来，满载而归，激动不已。领导和师傅们对他更为器重，将其作为年轻的专家来培养，他也为自己制定出了更高的发展目标。

此后，厂领导又多次派他去阿尔巴尼亚等国学习和交流提琴制作经验，使其技艺不断提高，同时也让他具备了更多的音乐素养。



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派出小白桦树交响乐团到北京来进行友好交流。但是到了北京，在装卸乐器道具时，把团里顶级大提琴手的专用提琴折断了。琴头琴身，身首两处。这下可急坏了苏联朋友，如果不能及时修好，影响演出是肯定的。更何况，首场演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要前来观看。交响乐队若没有大提琴，那就成笑话了。

情急之下，苏联朋友通过外交途径找到北京乐器厂帮助修复。厂领导将此重任交给了戴洪祥。

戴洪祥被火速接来，送到苏联朋友的住地。当他看到那把损坏的提琴和提琴手那焦急的神情时，意识到任务的艰巨。难也罢，易也罢，都不容多想多说，必须要用最快的时间和最高的技艺修好。戴洪祥没有二话，立即将其装车带回。

那的确是一把顶级的好琴，难怪提琴手不接受换一把琴的建议。戴洪祥将其小心翼翼地带回，连夜赶修，直到天明。第二天，早饭时间刚过，那位苏联艺术家就在外交部礼宾人员的陪同下找上门来了。告知今晚 7 点 30 分，毛主席要来看演出。

戴洪祥胸有成竹，认真而郑重地告诉苏联朋友和外交部的同志：下午四点之前，一定送到。

客人走后，戴洪祥一刻不停地忙碌。他小心谨慎，心细如丝，像女人绣花一样，细了又细。汗水不停地从头上往下流，衣服也浸湿了。经过一夜一天的精心修整，终于在下午四点之前，将修复如初的大提琴送到了苏联朋友的住地。当那位提琴手将琴拿在手上的那一刻，连日的忧虑一扫而光。他左看、右看，



竟找不到一丝损坏和修复的痕迹。然后又仔细的调好音，用手指来回拨动了几次琴弦，又试着拉了一段曲子，竟发现音色比原来还好。只见他把琴高高举起，喜出望外的大喊：“太好了！谢谢！你是怎么修的？怎么比原来还好？”戴洪祥微微一笑，说道：“满意就好！”

此时，苏联朋友哪里知道，戴洪祥早把修琴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至于完好如初，连一丝损坏的痕迹也看不出，那纯粹靠的是精湛的手艺。

小白桦树交响乐团在中国的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他们回国不久，戴洪祥便接到了去苏联访问的邀请。戴洪祥的名字，名扬海外了。此后，在中国举行的小提琴制作技艺比赛中，戴洪祥的琴连连获得金奖。

1983年，在德国举行的国际小提琴制作技艺比赛中，戴洪祥制作的小提琴，又一举夺得了国际卡塞尔金质奖。此后，戴洪祥获得国际大师称号。据戴洪祥的小儿子戴诚讲，这国际大师之名来之不易，那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畔“拉大锯”的营生中历练出来的。

东方大国的工匠精神，就像黄河水一样，流淌不息，在华夏之地赓续传承。



窦店苏村与隋唐名将苏定方

赵润东^{*}

房山区窦店镇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位于镇政府西北部的苏村来历与隋唐名将苏定方的关系却鲜为人知。欲知苏村来历，首先要了解窦店的历史。

—

人们常说：“良乡塔，半山坡，过了窦店琉璃河。”其实，良乡最早在窦店，而历史上的窦店又称旧店。窦店是个古镇，位于北京城西南 40 公里，距房山区政府所在地良乡 12 公里，正处于良乡与商周遗址琉璃河之间。这里阡陌交通，四通八达，自古至今为贯穿南北的必经之路，又是兵家驻守的交通要冲。

据史书记载，窦店古镇最早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今窦店村西，为燕中都县，隶属上谷郡。秦始皇二十三年（前 224），因人物俱良，改称为良乡县，自此良乡之名已有 2200

^{*} 赵润东：房山区政协原副主席



余年历史。明《大明一统志》上明确记载：“良乡县在府（顺天府）西南七十里，春秋时燕中都地；汉为良乡县，属涿郡；晋属范阳国，后魏属燕郡，北齐省入蓟县，寻复置；隋属涿郡，唐属幽州，后改固节县，寻改良乡；辽金元仍旧，本朝因之。”

由上述文字可以得知，窦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行政区属“中都县”了。秦时，改中都县为良乡县，隶属广阳郡；西汉时，置良乡侯国、良乡县，隶属涿郡；王莽新朝时会更名良乡为“广阳”，东汉时复称良乡；魏晋时，涿郡改称范阳郡、范阳国，良乡县仍隶属；后魏时良乡县隶属燕郡，北齐时一度省并入蓟，不久又复置。隋、唐、五代至辽，历代相因。据《旧五代史》记载：“（赵德钧）又于阎沟筑垒，以戍兵守之，因名良乡县，以备钞寇。”所谓阎沟即盐沟（现在的良乡），而现在的良乡便由窦店迁移而来。

那么，良乡县城为何要迁到盐沟来呢？据房山志料记载，这与五代后唐时期契丹的崛起，以及盐沟日益重要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盐沟位于涿州向幽州运送粮草的交通要道上，而且自古以来又是幽州通往中原大地的南大门。《资治通鉴》记载：“初，契丹既强，寇抄卢龙诸州皆遍，幽州城门之外，虏骑充斥。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虏多伏兵于阎沟，掠取之。及赵德钧为节度使，城阎沟而戍之，为良乡县，粮道稍通。”也就是说，五代后唐时期，契丹日渐强盛，四处侵袭，幽州城门之外到处是契丹骑兵，百姓出城砍樵打猎都受到影响。更有甚者，契丹兵经常埋伏在阎沟一带，抢掠送往幽州的粮食。为



保护南粮运送，打通涿州至幽州的粮道，使契丹无所伏兵，五代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在盐沟建立新的良乡县城，即盐沟城，良乡县治迁到盐沟，此后将盐沟更名为良乡县。

注：民国版《良乡县志》中关于良乡城的记载留在历史中的良乡城，建于明景泰二年（1451），初为土城，最初周长三里二百二十步，高约二丈。民国版《良乡县志》记载了新良乡城的情况及自明建成后的发展历史：“（城）周一千三百丈计六里三分。门四，东曰迎曦，西曰宝成，南曰就日，北曰拱辰。顶宽二丈，底宽四丈，高三丈。旧志原系土城，高二丈。明隆庆中知县安上达详请官帑，治甃易灰，高三丈二尺，但西门缺甃。城垂二十年，知县王道定补之。崇正庚午里面土城修补增宽。清二百余年，迄未大修，城楼皆就倾圯，内面亦多坍塌。西门迤南为居民使土成坑塹，夏间渟潦，近蚀城基，后屡经出示禁之。”

二

窦店古镇，历经沧桑，绵延千余载，成了中原的“京易御路必经之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了达到“示强威，服海内”的政治目的，于始皇二十七年（前 220），“治驰道于天下”。设秦驰道通过此地而东巡碣石；魏晋南北朝时，窦店又成为汉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和主要场所，是



北方各族起义军与北魏官兵多次交锋争夺的古战道；隋炀帝出师，水陆并进，其陆军线路经由窦店，直指高丽；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此处道路得到进一步修整，同时筑城派兵把守；到了宋、辽、金时期，由于兵家混战，国不安宁，道路时有兴废。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建都北京，历代帝王在境内的活动也日趋频繁。因此，明、清两代大修御路，更使这里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干线。

那么，最早的窦店不是良乡吗，为何又叫旧店呢？

据《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广阳故城以其属广阳国，亦谓之小广阳。后汉初耿弇追贼至小广阳，即此。阳乡城在县南二十五里旧店西一里许，旧传窦建德筑。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为夏王窦建德五凤元年，建德定都乐寿，取深冀易定等州，又尝攻李艺于幽州，此城或其时所建与！”由此得知，今日的窦店即古时的旧店，而旧店改称窦店，源于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称夏王时在旧店修筑古城阳乡城所至，窦店即由此得名。

注：根据《北京市房山区志》材料，窦店古城：“呈长方形，分内城、外城两层。内城为夯土打造，外廓为堆积土围。内城东西长 1100 米，南北宽 860 米。外廓东西长约 1200 米，南北宽 960 米。城与廓间距 20 米。城墙仅南、东、西三面尚断续残存。在南、东、西三墙中各有一门。城内靠西墙有子城一座，呈长方形，东西长 400 米，南北宽 300 米，其西城墙借用大城墙。城址地基稍高于四周地表，子城又高于城内地表，由于烧砖取土，导致地表有所降低。从地表和城墙夯土层中的绳纹陶片和



蓖纹陶片来看，具有明显的战国到西汉的器物特征。1979 年被列为北京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提起窦建德，人们自然会想起这位隋朝末年河北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窦建德（573—621），字建德，贝州漳南（河北故城县）人，世代务农。窦建德重信然诺，曾在乡下担任里长，（里长，古时为一里之长，又称里正、里君、里宰等，相当民国时期的甲长。）他在日常生活中，善于助贫济困，崇尚豪侠，为乡里人所敬重。

隋大业七年（611），朝廷招兵征讨高丽，从乡里挑选体魄健壮、勇敢优异的人担当小帅，于是委任窦建德当上了二百人长。在此期间，窦建德目睹了兵民生活之艰难与困苦，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作为平民出身的他义愤不平，公开抗拒征讨辽东，并且招集引诱逃避征兵和无家产的几百人，让受到官府迫害并杀死县令后投奔自己的同乡孙安祖带领，进入高鸡泊，举兵起义。隋大业十三年（617）正月，在河间、乐寿两县的交界处设立祭坛举行典礼，自称长乐王，年号就用这年的干支叫丁丑，设置机构并委任官吏。随后，他带领率部归顺的高士达起义军，先后击败占有曹、戴两州，自称宋义王的魏刀儿、击败擒杀弑君隋炀帝，自立为帝的宇文化及、诱杀活动于冀、定二州之间自称魏帝的孟海公等，建立夏国，称雄于河北。

据《旧唐书》记载：“建德义伏乡间，盗据河朔，抚驭士卒，招集贤良。中绝世充，终斩化及，不杀徐盖，生还神通，沉机英断，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宝被谗见害，凌敬、曹



氏陈谋不行，遂至灭亡，鲜克有终矣。然天命有归，人谋不及。”赞曰：“世充篡逆，建德愎谏，二凶即诛，中原弭乱。”

窦建德作为农民起义领袖，出生入死，骁勇善战，不贪财聚财，每当攻陷城镇打败对手，所得到的财物，一起分发奖赏给各位将领，自己不取一样东西。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简朴，平日里不吃肉，只吃蔬菜和脱皮粟米饭。他的妻子曹氏不穿丝织衣裳，小妻、侍女只有十几人。攻进山东聊城以后，俘获宫廷美女上千名，个个容貌姿色都绝顶娇艳。然而，都被他当即遣散。擒获隋朝文武官员和骁果军上万人，也同样遣散，而且听凭各自意愿，来去自由，各奔东西。在处理朝廷原有文武官员问题上，胸怀大度，不计前嫌，相继任命隋朝的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其他人员按照才能专长授予官职，交付实权。这些官民当中有愿到关中和东都去投奔他人者，照样发给足够的衣物食粮，派兵护卫，送出辖区。由于窦建德为人朴实厚道，坚持正义，“崇尚豪侠，重信言诺”，且体恤士卒，不贪财色，深为兵民所拥戴。

三

说起窦店来历，是由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称夏王并在此筑城而得名。那么，紧邻窦店的苏村又有何来历呢？关于苏村来历，世人说法不一。有人说古代这里曾出过一位苏姓的大将军，所以叫苏村；也有人说一位姓苏的大将军曾战死在此地，人们



为纪念他，便将村子命名为苏村。据《房山区村名志》记载：苏村，隋末唐初成村。隋朝名将苏烈曾在此征战，因此得名苏烈庄，后改为苏村。由此看出，苏烈随窦建德征战期间曾在此驻守过还是可信的，而说他战死此地就过于牵强了。因为苏烈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667）才病逝，享年七十六岁。

那么，苏烈是何许人？据史料记载，苏烈（592—667），名烈，字定方，以字行世，汉族，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县）人，唐朝初年杰出的军事家。明末学者、抗清名臣黄道周在《广名将传》中写道：“苏子定方，少年骁勇。乡里贼侵，赖之不惧。突厥从征，乘雾一涌。诛者不胜，降者接踵。贺鲁再征，攢槊殊猛。大雪不休，砍几绝种。后袭诸敌，三路云拥。面缚而降，献俘丹甬。论法应诛，苦求恩宠。葱岭以西，因而朝拱。”

苏定方少年时代骁悍多力，胆气绝伦。十五岁时便跟随父亲征战。隋炀帝大业（605—618）末年，其父亲苏邕率领乡兵数千人，为州郡讨伐贼寇。苏邕死后，信都郡（冀州）郡守令苏定方接替父亲统领部众。他在郡南大破清河叛军首领张金称，将其斩杀。接着又在郡西打败了邯郸叛军首领杨公卿，追击逃兵二十多里，斩俘颇多。从此，叛军们不敢靠近州县边境，乡里都倚靠他的保护才得以安定。

隋朝末年，窦建德领导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势如破竹，很快席卷全国。正值血气方刚的苏定方便慕名窦建德大名，率众欣然来到窦店投奔到夏王帐下。当时，窦建德麾下有个大将



高雅贤，见苏定方英俊魁梧，气质非凡，颇为喜爱，后收为养子。武德四年（621），窦建德败亡后，苏定方随高雅贤投靠窦建德旧将刘黑闥。在征战中，他参与攻城略地，冲锋陷阵，多次立下战功。次年，高雅贤不幸在洺水之战中阵亡。武德六年（623），刘黑闥继而兵败被杀，苏定方于是归隐故乡。到了贞观初年，唐太宗启用苏定方，任命他为匡道府折冲。折冲是唐初实施的府兵制，主要州设置军府，总称折冲府，当中设折冲都尉一人。苏定方即被任命此官职。尔后，苏定方策马扬鞭，率领全军将士征战于北部疆域，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很快成为一位威震四方的著名大将军。

据史书记载，唐贞观四年（630），苏定方被朝廷征调启用任命为骑兵首领，随兵部尚书李靖前往碛口（今内蒙古善丁呼拉尔）北伐东突厥。在夜袭阴山一役中，他作为前锋率两百骑兵，首先攻破颉利可汗牙帐（将帅所居的营帐），为击灭东突厥立下大功。公元657年，因多次立功，并能独当一面，被提升为高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具有极高的军事才能，谋略过人，用兵如神，并以其非凡战绩和正直为人深受唐高宗的赏识与信任，并屡次委以重任。

苏定方初任匡道府折冲，北伐东突厥后以战功授予左武侯中郎将、右屯卫将军等，他履任节度使以及行军大总管，直至爵封邢国公。他一生驰骋疆场数十年，多次征战西域和辽东，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为唐朝开拓疆域，平叛周边叛乱。其生涯有名的事迹有阴山夜袭，北击颉利，西灭突厥，东平百济，



南镇吐蕃，纵横万里，“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史无前例地将唐朝的版图向西拓展至中亚咸海，国境直抵波斯，向东延伸至朝鲜半岛南部，西域诸国也都震慑降服。唐高宗来到殿前的廊下，苏定方全身军装将贺鲁献给了高宗。为他记功行赏并授其左骁卫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封邢国公，另外封他的儿子苏庆节为武邑县公。晚年他受命担任安集大使，全面负责对吐蕃的军事防御。纵观历史，苏定方为大唐帝国立下卓越战功。唐朝立国 289 年，其广袤疆域至高宗朝达到了巅峰，唐朝的声威随之波及西北边隅和东方遐邦，既为中原的稳定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现今中国版图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高宗李治乾封二年（667），年已古稀的苏定方仍被委以重任，以七十多岁高龄镇守在西北边陲吐谷浑战场的最前线，在呼啸马鸣、瑟瑟寒风中，度过他戎马生涯的最后时光，享年七十六岁。苏定方病逝于前线，朝廷官员并没有及时奏告皇帝。待唐高宗闻讯后悲伤痛惜，责备身边的朝臣们说：“苏定方为国家立有功劳，按例应当褒奖封赠，卿等不说，致使死后荣宠未能及时颁下。言及于此，不禁哀伤悲叹。”可想，唐高宗对苏定方多么的器重。因苏定方几次出征获胜均自良乡广阳（入唐后属幽州），于是唐高宗下诏追赠苏定方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谥号为“庄”。“谥号”是指古时帝王、贵族、大臣或有地位的人死之后，依据其生前事迹给予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而这里的“庄”字属于褒谥，意思又很多。如胜敌志强、



屡征杀伐、武而不遂、死于原野、兵甲亟作等。正因为苏定方曾立下赫赫战功，才受到唐高宗的赏识，并在其死后下诏追赠并谥号为“庄”，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四

关于苏定方，历史上曾给予了较高评价。据《旧唐书》载：“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兴言及此，不觉嗟悼。”“邢国公神略翕张，雄谋戡定，辅平屯难，始终成业。疏封陟位，未畅茂典，盖阙如也。”《唐朝贤将传序》载：“李刚：李大亮宿卫之忠，裴行俭、苏定方术略之奇，秦叔宝、薛仁贵、李嗣业搏战之勇，高崇文纪律之严，王忠嗣执守之固，李抱真训练之精，张万福乐善之笃，李光颜、愬（李愬）谋虑之决，皆凛然有贤将之风。”

依照唐代的惯例，要为古代名将设置庙宇，而七十二位名将当中就有苏定方。苏定方自太宗时期被启用，在高宗时期因屡立战功而擢升嘉奖，并且死后追封。如唐中宗（李显）神龙元年（705）七月，唐廷追封前代功臣二十五家，苏定方仍列名单之上，“所食实封，并依旧给”。到了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九月五日，德宗按功评定前代功臣，苏定方等二十四人被定为第二等（即上等和次等）。十二月，朝廷敕：“国初以来将相功臣。名迹崇高。功效明著者。宜差次分为二等”。经过评定，苏定方等三十四人被定为功臣上等。建中三年（782），



时任礼仪使的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主要成就，其中就包括“右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

再看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一书，苏定方亦位列其中。元代陈广靓编著《事林广记后集》上记载：“邢公御侮（右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阚如虓虎。生执都曼，钳驱贺鲁。暨平百济，凡攻皆取。伐国之功，焜耀千古。”而明末著名学者黄道周在《广名将传》上也写道：“苏子定方，少年骁勇。乡里贼侵，赖之不惧。突厥从征，乘雾一涌。诛者不胜，降者接踵。贺鲁再征，攒槊殊猛。大雪不休，砍几绝种。后袭诸敌，三路云拥。面缚而降，献俘丹甬。论法应诛，苦求恩宠。葱岭以西，因而朝拱。”

古代文人学者著书立说对苏定方给予高度评价，而当代伟人毛泽东主席也称其为名将与大将。如在《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中写道：“苏定方，名将亦大将，年七十六。”正因为苏定方是一位深具历史影响的人物，所以在历史文献中占有一定席位。

徐培根等所著《中国历代战争史》中写道：“又观苏定方之用兵，颇能继承李靖用兵之思想与精神，加以苏定方具有大无畏勇毅之魄力与胆力，故常能以寡击众，长驱直进，行数百里远距离之追击战。如在双河之追击战，蹋雪深二尺而进，日夜兼行，进袭贺鲁之牙帐，无怪贺鲁之迅速崩溃也。由此观之，苏定方之用兵，可谓神矣。”



于赓哲在《大唐英雄传》中这样评价：“在真实的历史中，苏定方不但为人正直，而且堪称唐前期的传奇将领，他一生东征西讨，从黄沙漫天的大漠到惊涛骇浪的大海，战线纵横将近万里，前后伐三国，皆生擒其主。即便是今天，看他的事迹依旧有一种大气磅礴、热血沸腾的感觉，可以说他是唐高宗时期军事顶峰的象征。”

纵观历史文献，苏定方的事迹不但在中国广为传颂，而且在日本、朝鲜、韩国等国也广为颂扬。如位于今韩国扶余郡石城面，傍白马江东岸的破阵山，相传为苏定方率军大破百济之处：据《高丽史》《世宗实录》载：“唐苏定方祠在大岑岛，春秋降香祝致祭。”

据资料得知，位于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定林寺的五层石塔，俗称平济塔、百济塔。塔高 8.33 米，由花岗岩雕砌而成，距今已有 1300 多年历史。由四通石碑围砌的石塔底层，额篆书《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八个大字，碑文楷书，阴刻，碑云“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为唐朝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邢国公苏定方平灭百济后所刊刻的纪功碑。故又称《苏定方塔》《苏定方碑》《苏定方平百济塔》《苏定方伟绩勒铭》《苏定方平百济塔碑铭》。作为古代流传至今有关大唐联合新罗灭亡百济的珍贵遗物，现定林寺址平济塔已被韩国政府列为第 9 号国宝；咸亨四年（673）章武郡公苏庆节为纪念其父苏定方所敬造的佛经残本《大楼炭经》，现藏于日本京都知恩院；今朝鲜半岛南部锦江下游，在中国又称白江，日本史籍称之为



白村江。韩国白马江的名称由来还有一民间传说，据《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十八载：“自虎岩顺流而南至于扶苏山下，有一怪石跨于江诸石上，有龙攫之迹，谚传苏定方伐百济，临江欲渡，忽风雨大作，以白马为饵而钓得一龙，须臾开霁，遂渡师伐之，故江曰白马，岩曰钓龙台”。18世纪朝鲜学者李德懋的诗作《客中逢曾若将游白马江》“瑟瑟寒江漾客舟，济王宫树不禁秋。只缘当日龙耽马，唐将靴痕石上留。”便引用了这一典故。

根据《新增东国輿地胜览》载，藏军洞“在县北九里，与太祖峰相对，中有大路，洞门曲狭，行人见之，疑若无洞，深入其内，极广阔，可藏万余兵，世传唐将苏定方伐百济时，藏兵于此，故因以为号”……

行文至此，隋唐大将军苏定方其人其事以及在历史上的影响可谓清晰了。作为窦店及苏村的人们，岂不为有这样一位名传天下且战功卓著的大将军命名村名而感到骄傲与自豪吗？

附：

《窦建德碑》

“云雷方屯，龙战伊始，有天命焉，有豪杰焉，不得受命，而名归圣人，于是玄黄之祸成，而霸图之业废矣。隋大业末，主昏时乱，四海之内，兵革咸起。夏王建德以耕氓崛起，河北山东，皆所奄有，筑宫金城，立国布号，岳峙虎踞，赫赫乎当时之雄也。是时李密在黎阳，世充据东都，萧铣王楚，薛举擅



秦，然视其创割之迹，观其模略之大，皆未有及建德者也。唯夏氏为国，只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故兵所加而胜，令所到而服，与夫世充，铣，密等甚不同矣。行军有律，而身兼勇武，听谏有道，而人无拒拂，斯盖豪杰所以勃兴而定霸，一朝拓疆千里者哉！或以建德方项羽在前世，窃谓不然，羽暴而嗜杀，建德宽容御众，得其归附，语不可同日，迹其英兮雄兮，指盼备显，庶儿孙长沙流亚乎！唯天有所勿属，唯命有所独归，故使失计于救邻，致败于临敌，云散雨覆，亡也忽然。嗟夫，此亦莫之为而为者欤！向令运未有统，时仍割分，则太宗龙行乎中原，建德虎视于河北，相持相支，胜负岂须臾辨哉！自建德亡，距今已久远，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知其名不可灭及人者存也。圣唐大和三年，魏州书佐殷侗过其庙下，见父老群祭，骏奔有仪，夏王之称，犹绍于昔。感豪杰之兴奋，吊经营之勿终，始知天命之莫干，惜霸略之旋陨，激于其文，遂碑。”

注：唐文宗大和三年（829），魏州（治今河南安阳）书佐殷侗有感于其事，特在庙中立了一块纪念碑《窦建德碑》。



房山清代县令高骧云之墓的遭遇

赵志清 *

我看了房山区政协原副主席赵润东先生写的《一代清官高骧云》的文章后，对先生提到的高骧云安葬在房山城南的北尚乐村很感兴趣。第一，我就是北尚乐人；第二，好的官竟然埋在了北尚乐，惊奇，惊喜；第三，我喜欢文史，我一定得探个究竟。

于是，我回到了北尚乐开始打听高骧云葬在了什么地方。问了好几个年长的老人都说不知道，就连我父亲这位 85 岁的老党员、老书记竟然也不知道，我感觉很奇怪。但我并没有放弃，只要遇到北尚乐的人我就和他讲一代清官高骧云的故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 1 月底，我又和本村的一个 30 多岁侄女讲起此时，她竟然知道，我很是诧异。问了这么多岁数大的长辈都不知道，她竟然知道！原来，她们家就住在附近，她的爸爸给她讲过。

高骧云，生于清嘉庆元年（1796），浙江绍兴人，在蓟州、

* 赵志清：北京书协理事，房山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密云、良乡、怀柔等七洲县任过知县，咸丰年间来房山做知县。他多才多艺，文采出众，严谨治学，勤于政务。房山地势地形复杂，他为了准确地了解房山，亲自到实地查勘山川河流的走向、村镇的位置和地理环境，亲自绘图，记录说明，修补完善县志。他倡办教育，鼓励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兴办教育，努力改变老百姓的愚昧无知。他勤奋好学，潜心钻研，著书颇多，如《安昌志》《仰止编》《说性》《杂著》《可也简庐笔记》《孟子外书》《养恬斋笔记》《津河客集》等。他勤政廉洁，大事小情，事事关心。他不结交权贵，不寻酒作乐。

咸丰三年（1853）春，高骧云到保定上任，看到该县南北洼地皆因去秋堤溃而淹于水中，民生困苦。为修复堤坝，高氏上书府台力劝相邻各邑一同开工，以利救灾，并就关键的工费之难承诺：“卑职捐给饭食劝令合力助工。”

咸丰七年（1857），房山闹蝗虫，所过之地损失惨重，灾区过半，县令高骧云紧急动员老百姓全力捉捕。为了提高老百姓灭蝗的积极性，高骧云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在房山城南设场，按斤两付钱。全县妇女老幼纷纷参加到捕蝗队伍，效果十分明显。捕蝗行动，保住了庄稼，保证了收成，使得当年全县人民生活稳定。百姓称赞高骧云是个好县官。

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高骧云因病疾去世，年仅66岁。高骧云是个清官，乃至死后无钱下葬，最后在县人和亲友的资助下，在县西南、北尚乐西北买了马家一小块墓地葬了。



高骧云墓的位置

马家的坟在下边。

20 世纪 50 年代为实现“农业高产”，提出“平坟开荒，向鬼要粮”“人换思想地换装”的口号，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平坟运动”，除“烈士陵园”及国家认定有“历史价值或文物价值”的坟墓，一律平毁。北尚乐是 70 年代初开始平坟的，因为没有给高骧云的陵墓定为文物，所以也被平了。

高骧云之墓，后来因没人来上坟，上面长满了酸枣树。这块地属于第四生产队，是四队社员平的，本来平完了不影响种地，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当官的墓，以为里边会有值钱的东西，三四个人竟然把墓挖开。让他们扫兴的是里面只有一副眼镜、一支烟袋和一个铜顶。他们不知道高骧云是个清官，是一个有作为的好官，就这样把墓挖开了。

高骧云的墓里边由青砖砌成，白灰粉刷，很是素净。高骧云的棺木在东侧，与西侧穴位垒砌的一个小方窗相通，西

过去的人都讲究风水，特别是坟地，高县令的坟地也是有人看过的，它背山面水，空间开阔。而且，马家的坟也在此，当片村民戏称“高官骑马。”因为，高县令的坟在上边，马



高骧云墓的残砖



侧应该是给夫人预留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夫人并没有葬在这里。里面依然干净，说明墓葬里边没有进过雨水，与这里的地势高有关系。

墓挖开后，高骧云身着朝服，蓝、绿、黄相间。平坟的人将尸骨扔到地面，附近一张姓村民看到朝服还挺好，用手撕下一条，说：“还挺结实！”便系在了腰上。那副眼镜被平坟的一个姓杨的拿走了。棺木一点不腐，被拆解用作了逛地板（前边用毛驴拉着，为把土块逛碎，把地逛平）。

墓前还有一块青石墓碑，加上底座约两米高。墓志铭是清代著名文人宗稷辰所刻，上面刻的什么已没人记得了。墓碑的命运也很惨，碑座加工成碌碡，用来压地了，碑身被王姓村民砸了推回了家。

此时我想起一句话，用在这儿最合适不过了：“没文化，真可怕！”

（部分内容根据村民张学斌目睹讲述）

